

## 書 評

劉 靜 貞\*

F. W. Mote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ix+1106 pages, ISBN 0-674-01212-7

《帝制中國：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一生最後的一部大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牟教授早年曾寫過《中國思想之淵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介紹先秦諸子思想的特色和交互關係，但真正的學術專長在於元明史，曾參與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至於這本長達一千頁的巨著，歷述自唐末五代到清朝中葉這一長時段的歷史變遷，則可說是他自1956以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講授中國史的總成果之展現。

據說此書緣於牟教授曾與同在普林斯頓任教的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先生有約，要合寫一部給大學生讀的中國通史，故兩人分工，從秦漢到唐的中華帝國史前半部由杜先生執筆，牟先生則負責宋元明清的下半部。後來杜先生因主持劍橋中國史的編撰而不得不放棄前半部的寫作計畫，牟先生卻終於在退休多年之後完成此書。

---

收稿日期：2006年3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4月19日。

\* 作者係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

Ching-cheng Li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Soochow University.

傾畢生所學，寫一部縱切橫剖既博廣又精深，卻又能文筆淺白的通史性論著，似乎是很多歷史學者的心願。但真正要付諸實現，實在需要過人的毅力與學力。只是成書之後，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似乎仍然很難擺脫一些講歷史和讀歷史時既有的迷思，免不了要落入「爲什麼要唸歷史？」「什麼才是歷史的重點？」「該教什麼樣的歷史？」甚至「何謂歷史？」的迷惘中。

於是在序言中，牟先生先從他自己作爲研究者的親身體驗說明：治中國史者，必須對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文化有全盤的認識，才能好好地進入自己感興趣的某個部分去研究。然後又以退爲進地承認，我們的確應該認識當代多些，然而除非能先掌握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歷史經驗，否則是無法適切地理解當代中國的。這些話雖然是說給美國人聽的，但是這種強調研究「局部」議題亦當與「整體」歷史理解相聯繫的態度，以及要將「過去」與「現在」相連結的期許，看在我這個經常面對學生懷疑眼神的第一線歷史教學者眼裡，實在是心有戚戚焉。

然而，全盤性理解過去的歷史，可以有如許好處的期待，要靠什麼樣的內容才能落實呢？據牟先生自己的說法，他是自覺地選擇政治面作爲他敘述歷史的重點，因爲這是他自認能做得最好的方式。而在政治相關的敘述中，他所挑選的人物和事件則是他相信最能吸引現代讀者，又最能展現歷史動向者。

展讀全書，自西元 900 年至 1800 年的斷限，對應到中國史，恰與五代之始（907）和乾隆之死（1799）的時間點相合。這段時間被切分爲五個部分來講述，其標題分別是：征服王朝與北宋（1900-1127）、征服王朝與南宋（1127-1279）、中國與蒙古世界、本土王朝明之統治（1368-1644）、中國與清初的世界。基本上這是以時序爲編排的基礎，從表面看，似乎仍是一種朝代史的分期。但如果進一步關注到其內容之鋪陳，其實並不只是單純地由朝代興亡著眼而已。

對於牟氏而言，這九百年時間，包括了唐宋變革期、中國新傳統時代的形成與帝制晚期等階段，同時也是所謂「征服王朝」在中國擴張其統治的時期，這段起伏變遷的歷史，實有其內在的一致性。那就是農業的中國因著與所謂內陸亞洲民族之間互動關係頻繁，引發出的一連串事件，並因此所誘發的體制性變化。牟氏認爲，這樣的互動關係以政治事件與政治體制的變化最

為明顯，因此，他最主要的關心，即在於建國者與其統治體制之所以建立，以及帝國在運轉過程中所面對的各式挑戰與因應。

正如牟氏所自承，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用一本書面面俱到地寫盡歷史，所以他選擇以政治史為主線，尤其是政府與政治體制的變遷，並利用傳記資料加意描寫皇帝、宰相和宦官，還有士大夫官僚和部族領袖如阿保機、阿骨打和成吉思汗，因為後者不但關係到邊境政策與國際關係，也是引發征服王朝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重要影響的關鍵人物。

因此，本書雖以《帝制中國》為書名，但顯然不只是一要突顯西元900年後中國在政治方面皇帝統治的逐步強化與定型；而是以皇帝統治制度為基調，由此論證出整體社會歷史風貌變遷的方向。這對牟氏而言，是可行且應行的途徑。他並由此鋪陳出：以帝制為基調的中央集權化歷程，以中國儀禮為本位的國際關係體系塑形，貿易的遞增與人口的成長，還有文人士大夫階級的形成，印刷術與新儒學之發展……。因為牟氏深感，這些正是中國高度文明之所以成就的歷史表現所在。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所謂歷史即政治史的說法，日本學者寺地遵甚至論證說政治現象可謂是人類諸活動之總合；無獨有偶，牟氏也將這本通史性著作的主軸放在政治史上。但是，與其因此便論證說：牟氏認為政治人物與社會、制度的互動，及其個人意識在其中的作用，乃是說明歷史發展最有效的方式；並且以之對照於目前學界頗受鼓吹，以社會制度結構或是底層人民生活史為主軸的敘述方式，極力分辨其間高下。倒不如試著思考：對於牟氏和他所歸屬的學術社群，甚至時代而言，這種思索並解說歷史的方式，在閱讀歷史以理解過去和現在的關係時，何以具有無可取代的意義。尤其在讀過黃仁宇從技術條件與制度結構著眼以評價中國歷史，委曲陳說各類人物在此框限中枉然掙扎的歷史解釋之後；再面對牟氏著重「人」在歷史長流中的作用，不容許歷史人物迴避自身判斷錯誤責任——特別是皇帝——的想法和寫法。至少對於我自己而言，實在不能不認真地思考：歷史研究中究竟應該如何（或是可以如何）剖析「人」與其「歷史情境」間交互應對關係的根本性問題。而且也不能不細思，是否真有所謂完整呈現歷史整體面貌，或是完全掌握歷史發展主軸的可能，又要如何才能達成這種可能？

一個不一定完全貼切的借喻，經過不同人書寫而成的各式歷史作品，很

像是讓很多小朋友甚至成人都著迷的萬花筒。因為說穿了，經過不同人手晃動的萬花筒，雖然拼組出一幅幅千奇萬幻，截然有別的花彩畫面，但論其實質，終究就是那麼一筒零碎的原料。當然，歷史研究不可能像萬花筒晃動時那樣地任意。但是要說明並呈現「過去」之間組合關係的取徑，的確不只一種；前提是將原料轉化為「歷史」之時，必須經過嚴謹的檢證過程，並且經得起學術的追問。

事實上牟先生自己也不覺得他所呈現的，就是這九百年歷史的全貌。所以他在書寫歷史史事變遷，勾勒歷史發展脈絡之餘，也不忘提醒讀者，在書寫與閱讀歷史之際，必須切記，歷史呈現的面向一定會因為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出現輕重有別的問題。他希望讀者了解，這本書要談的既是中國的歷史，自然會以中國為主軸來述說，相對地，世界上其他相關人事就只能在這個主要脈絡之下被帶入，而這的確只是眾多講述歷史方式中的一種。（頁 30）他還要讀者注意，歷史學者永遠也不可能掌握完整的資訊，而且我們今天所關心的議題，和留紀錄者想要告訴我們的，可能南轅北轍。（頁 72）

所以，當我們讀著牟氏用政治事件以及君主、英雄所建構起來的這九百年歷史時，理當先有這樣的認識：經過牟先生重建工程而呈現於今日讀者眼前的「歷史」，當然不可能是「過去」的完整再現，其中不但有著一些必須靠想像填補或未及填補的罅隙，也有著牟先生為求幫助讀者適切理解當代而特別加強闡發的史事。最明顯的例子是，既然牟氏認為這九百年起伏變遷的內在一致性，在於農業中國與內陸亞洲民族之間的互動關係頻繁，那麼就無怪乎他在政治史所展開的基調上，要特別注意陳述非漢民族或是外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且藉此構築中國人與非中國人在九百年間如何相爭、相交且相調適的歷史過程，視中國為一歷史建構的結果。只是，在這種企圖補救以往征服王朝被忽視，極力從漢族中心論轉為多元史觀的寫作過程中，牟氏對於周邊民族政權和蒙元史，以及歷朝和周邊關係的論述，究竟是明晰而平允，抑或是反而造成某種矯枉過正的遺憾，恐怕要等到更多學術研究成果出現，才能夠進一步澄清了。

牟先生說他自教書以來，就希望能將中國清楚地呈現在美國學生面前，這本書正是出於此長期努力的積累。而他所期待的讀者群，乃是對偉大文明有興趣的一般人，他們在閱讀這本書時已經有一些自己的問題和經驗，而且

不是只想要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牟先生對於讀者的期待，讓我不禁想起宮崎市定對於他如何寫《中國史》所作的說明。同樣是歷史學者晚年的回顧之作，宮崎先生則是以「具有前途的年輕一代為對象」，要與「那些即將開始做學問的人」「研討學問」。所以他是「何謂歷史」作為總論首章，並且聲明自己撰寫此書時，對於既有的概說書，特別是教科書，不論是他人或自己所撰，都儘可能地不看；以免產生那個也想寫入，這個也想寫入的欲望，致使內容極其繁多，著者本身的思考反而被埋沒其中。對於他自己記憶中全然忘卻的事實，他自信那是只有被遺忘之價值的事實。宮崎的自信當然是史學大師才有的自信，但也源自一種歷史學發展到某一種程度後就變成文獻學的擔心，因此他特別強調歷史學是以選擇來決定的學問。

相對於宮崎期待與之對話的專業讀者，牟先生所選擇的乃是需要引導指示的一般人。從繁蕪的史實中擷取精要事件，使讀者費時不多，便能獲知一個歷史發展的特色和梗概；並且敘述和解釋兼備，嚴肅和趣味並融，這樣的歷史教科書，似乎是很多人的期待。從美國讀者發表在網路上的書評來看，牟氏的文筆確實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只是以千頁份量撰寫的半部帝制中國史，也讓不少人卻步，甚至想像它的讀者會是準備中國歷史考試的研究生們。但這或許就是牟氏所作的另一重選擇與堅持，在這個講求輕薄短小的時代，牟先生以他最擅長且認為最好的方式，為那些對偉大文明有興趣的一般讀者們，開通一條認知帝制中國後九百年歷史文化的渠道；而且用大量的人事與論證，讓讀者具體地體認到——歷史的認知不可能只透過一個簡單的答案。